

密友·情敌·侍女·主体： 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娇红记》娇红关系新释

杨生莉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

DOI: 10.65285/RWYSHKX.V2I3.007

摘要：关于《娇红记》中娇娘与飞红的人物关系，学界多将飞红界定为主仆间的利益纠葛、爱情中的情敌冲突，或将飞红视为服务于申娇之恋的功能性角色，鲜有从主体建构与心理认同的角度剖析二者深层的精神联结，忽视了其行为背后指向娇娘的核心情感内核。娇娘是飞红基于镜像认同所构建的理想自我，飞红将其视作想象中的密友，其效仿娇娘逾矩行为与娇娘形成雌竞，是以申纯为模仿实践对象的镜像行为表达，并非源于对申纯的爱慕。引入拉康镜像理论，从心理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角度重新解读二者的镜像关系，结合晚明女性的生存境遇能够发现飞红对娇娘的多种复杂情感，从镜像模仿到镜像崩塌后的主体觉醒，实为封建底层女性在阶级与礼教桎梏下，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与对女性共同命运的无声叩问。

关键词：《娇红记》；娇娘；飞红；镜像认同；主体意识

Close Friends, Love Rivals, Maid, Subjec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in 'Jiao Hong 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Mirror Theory

Shengli Yang

College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Regarding the charac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oniang and Feihong in "Jiao Hong Ji," most academic studies define Feiho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ster-servant interests, the rivalry in love, or regard Feihong as a functional character serving Shen Jiao's romance. Few analyze the deep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neglecting the core emotional essence directed toward Jiaoniang behind their actions. Jiaoniang is the ideal self constructed by Feihong based on mirror identification; Feihong regards her as an imagined close friend. Her imitations of Jiaoniang's overstepping behaviors form female rivalry with Jiaoniang, representing mirror behavior targeted at Shen Chun as the object of imitation, rather than admiration for Shen Chun. By introducing Lacan's mirror the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ir mirro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reveals Feihong's complex emotions toward Jiaoniang. From mirror imitation to the subject's awakeni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irror, it reflects the quest for self-value and the silent questioning of the shared fate of women by lower-class wome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feudal hierarchy and ritual codes, within the late Ming context.

Keywords: "Jiao Hong Ji"; Jiaoniang; Feihong; mirror identificati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前言

孟称舜《娇红记》作为“至情论”的经典之作，也为解读晚明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提供了独特样本。学界对《娇红记》的研究，聚焦于文本改编、人物形象塑造、舞台性及核心人物关系等方面，梳理出娇娘、飞红的形象特质与二者关系的表层特征，却未深入剖析二者的深层心理联结。刘卫珍对比了其与宋梅洞文言小说《娇红传》的差异，指出孟称舜在保留申娇之恋主线的基础上，丰富了飞红的形象内涵，将小说中扁平的“奴婢”形象塑造为具有复杂心理的底层女性，凸显了传奇对原作的突破与创新^[1]；刘婷婷则挖掘出作品中蕴含的悲剧情蕴，指出作品通过申娇之恋的悲剧，展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2]。周礼丹指出飞红

是申王爱情的障碍，是申娇爱情至情至性的衬托对象，是悲哀的暗恋者^[3]；庞越则从舞台性角度切入分析，指出飞红的行为在舞台叙事中具有推动情节、激化矛盾的重要作用^[4]。唐昊提出“娇红双姝”的核心研究视角，认为娇娘与飞红两位女性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悲剧主体，符合“情正”的主题^[5]。申港慧认为“飞红”具有女性意识，既是率真大方、叛逆自信的婢女，也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6]。任小芳认为《娇红记》是借飞红表达晚明重“情”的时代特征，对认识晚明婢女生存境况提供借鉴，体现出作者“发乎情，止乎礼”的价值观念^[7]。

现有研究将飞红视为申娇之恋的附属，割裂其与娇娘的深层心理联结，未发现其情感与行为核心指向娇娘而非

申纯；缺乏对其行为动因的深层心理挖掘，未厘清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误判其行为本质，忽视其行为非主动意识表达。事实上，飞红的行为不能简单归因于对申纯的情欲或对主仆阶级的反抗，娇娘之间并非单纯的主仆或情敌关系，而是底层女性对理想自我镜像的投射、认同、模仿与镜像破裂后的自我觉醒的完整过程^[8]。以拉康镜像理论为切入点，从想象中的密友、雌竞中的情敌、不彻底的婢仆、被催生的主体四个维度，结合文本细节剖析飞红对娇娘的镜像认同、行为逻辑及复杂情感，突破传统研究框架，还原其形象本质，挖掘背后对封建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

一、想象中的密友

拉康镜像理论认为，个体在进入象征界之前，会在想象界中通过对外部他者的镜像认同构建理想自我^[9]，镜像的选择往往与个体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与可参照性，个体将自身的美好期待全部投射于镜像之上，形成对镜像的深度情感依附。娇娘与飞红之间存在可供镜像认同的相似性基础，这让飞红在潜意识中将娇娘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个体，而非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飞红自报家门“与小姐同庚同月而生”，同龄的设定让她产生与小姐本是同类的心理认知，二者皆拥有“姿色”与“文翰”的特质，更让飞红在娇娘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本可与之比肩的自己。在封建阶级壁垒森严的背景下，身份与阶级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隔阂，而孟称舜通过消解飞红与娇娘在年龄、才情、容貌上的差异，为飞红打破阶级隔阂、构建镜像认同提供了心理可能。

为了贴近这一理想镜像，飞红主动在想象界中构建起超越阶级的密友关系，其行为举止呈现出只有密友才有的亲昵、默契与情感倾诉欲。《会娇》一出中，老爷、奶奶令娇娘初见申纯时，飞红以“小姐未曾妆束哩”为借口替娇娘解围，顾及娇娘体面；她看破娇娘对申纯的情意，以“小姐初见，怎便恁般相知哩”调侃，显示出闺中密友的随性。《晚绣》一出中，飞红敏锐察觉到娇娘的思春之态，以“敢则惜春光去渐赊，听春规晓不歇，一般般害的个伤情切”直击其内心，更直言“你五分心事我已三分晓”，足见其想成为娇娘情感倾诉者的强烈期待。她坚信自己与娇娘是超越阶级的灵魂密友，在想象界中形成镜像共生状态。《和诗》一出，飞红极力促使娇娘与申纯和诗，直言“和得好诗，姐姐，你和申家哥哥正是一对儿”，娇娘的情感自由本质上是飞红对自身情感自由的期待，娇娘的幸福便是她想象中镜中自我的幸福。此时飞红完全沉浸在镜像认同的密友想象中，视自己与娇娘为超越阶级的情感共同体，为娇娘的心动而欣喜、为其忧愁而担忧。

但是，飞红构建的密友关系是一场误认，是想象界中的单向镜像认同^[9]，娇娘从未将飞红视为真正的密友，坦言“不如意事常八九，与人言无二三，我心中之事，怎对飞红说的呵”，在她眼中，飞红终究只是“口儿欠稳”的婢女，不配成为自己的情感倾诉者，即便可以短暂互动，娇娘也始终认为阶级的隔阂从未真正消除。所以飞红的密友想象始终处于虚幻的状态，让她更加渴望贴近镜像，为后续在

镜像模仿中陷入逾矩与雌竞埋下了隐患。

二、雌竞中的情敌

拉康认为，个体在借助他者构筑自我形象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形象的背离和异化。一方面对自我形象有一定的感知和认识，另一方面却是自我形象的不在场，所认同的自我形象不过是幻觉和虚构，个体最终是结构拆散的或者未结构的。^[10]那么这意味着，飞红成为申娇之恋的情敌，并非源于成熟的主体意识与主动的情感争夺，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镜像模仿行为^[11]表象上的情敌身份，实则是她试图证明自己与镜像本无差别的心理宣泄。

娇娘的逾矩为飞红的模仿提供了“正当性”心理暗示。在飞红的镜像认知中，娇娘是完美的理想自我，是恪守封建礼教的贵族才女，而《密约》中她撞破申娇二人私会，发现崇拜的镜像并非“好人家女模”，也会“迎风待月”“偷吟诗句”，其镜像认知发生微妙变化，镜像模仿从无意识的情感依附转变为行为效仿，她试图通过与申纯扑蝶游戏，实现与娇娘相同的行为，证明自己与镜像拥有同等权利。当这一模仿受到娇娘打压，飞红的反抗随之而来，雌竞由此形成。娇娘为维护情感排他性，对飞红进行严厉阶级打压，贬斥其与申纯的游戏互动，直言丫鬟“止不过房中刺绣添针黹，妆台拂镜除香腻”，斥责其“游月下，笑星前，看花底”是“春情一片闲挑起”，甚至以“粗棍儿敲杀你丫环辈”相威胁。这一行为本质是强调主仆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击碎了飞红镜像平等的认知，引发其强烈反抗，飞红发出“难道女人家不是人那？”的控诉，是为了维护尊严、反抗娇娘对其与镜像平等地位的否定。《红搆》中的告密行为更是雌竞中的极端宣泄，她并非为破坏申娇之恋，而是报复娇娘的阶级打压，反抗娇娘的双重标准，试图让娇娘也体会逾矩的后果，从而在心理上实现与镜像的平等。纵观飞红的雌竞，只是镜像认同下的行为冲突，是底层女性向理想自我靠近时遭遇阶级壁垒后的心理宣泄，核心情感始终独指娇娘。

三、不彻底的侍女

拉康镜像理论的核心内涵之一，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消解的落差，这种落差会成为个体永恒的心理冲突^[8]，当个体处于严苛的社会规训与阶级壁垒中时，这种冲突势必会被进一步放大。飞红的“不彻底”性，首先体现在其模糊的身份定位，让其始终无法在象征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镜像认同与现实身份冲突的直接体现。飞红拥有“老爷侍妾”与“娇娘贴身丫鬟”的双重身份，看似比普通婢女身份稍高，实则处于“非妾非婢”的尴尬境地：作为侍妾，她“实未沾身”，从未真正拥有侍妾的名分与地位，无法进入主家阶层；作为贴身丫鬟，她虽比旁的婢女更接近权力中心、得到更多信任与倚重，却终究还是依附于娇娘的奴婢，需恪守婢女本分。这种模糊身份让飞红既渴望以侍妾身份与娇娘平起平坐、实现镜像认同下的平等，又不得不以丫鬟身份侍奉娇娘、接受底层婢女的现实，催生出其超越身份的傲慢心性，甚至需要

小姐自降身份，全然背离传统婢仆本分。飞红告密后，娇娘因深知其对自己情感走向的关键影响，不得不主动示好、“屈事飞红”，飞红也正因这份特殊对待才重新助力娇娘，可见其侍奉并非源于对主家的忠诚或对申娇之恋的认可，而是建立在自身傲慢与镜像认同被满足的基础上。

其次，飞红对娇娘的情感复杂，夹杂着羡慕、期待、怨恨与心疼，也超出了侍女的范畴。这份复杂情感让飞红的婢仆行为始终摇摆，既想维护镜中自我的幸福，又放不下自身傲慢与身份焦虑。《泣舟》一出中，飞红见娇娘为情垂死，自行“潜书唤申生”并放风，此时怨恨消解，试图维护娇娘情感诉求；但《询红》一出，面对老爷询问娇娘婚配意愿，作为最了解娇娘心属申纯、誓死不嫁帅子的人，她却含糊其辞，既不敢违背老爷意志、突破阶级规训，又无法以成熟主体意识做出正确抉择，最终以看似折中的方式将娇娘推向婚姻绝境，成为压垮娇娘的重要稻草，使其走向殉情悲剧，也让飞红“不彻底的侍女”形象走向极致，彻底背离侍仆本分，成为间接导致娇娘殉情的推手，消解了其婢仆的忠善底色。

四、被催生的主体

拉康认为，镜像认同的崩塌并非主体的消亡，而是主体真正走向自我确证的开端。当理想自我的镜像彻底崩塌，个体便会从想象界的镜像误认中走出，直面现实自我与社会现实，在对现实的反思与认知中完成自我重构^[12]，实现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

娇娘的死亡带来了镜像的灭失，既是飞红理想镜像彻底崩塌的标志，也是其从镜像误认中走出、实现主体觉醒的开端。在《合冢》中，飞红面对娇娘的灵位，直言“这的委是飞红之罪”，将娇娘与申纯的死亡归咎于自己在《询红》中的隐瞒，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始终以娇娘为镜像，围绕镜像的幸福展开所有行为，试图通过模仿向镜像靠近，却最终因自身的懦弱与隐瞒间接导致了镜像的消亡。这让飞红首次跳出镜像认同的桎梏，不再将自己视为单纯的镜像模仿者，而是开始以独立视角审视自身行为与命运，自我认知的重构自此开启。面对申纯的死亡，飞红未表现出丝毫惋惜或失恋之情，其情感指向也愈发清晰。当众人扫墓祭拜时她的唱词中只有对娇娘的思念与追思，无半分对申纯的提及。这一文本事实说明镜像的消亡才是其真正的悲痛之源。她哀叹娇娘“聪慧多情，颠倒为此四字所误”，也在这份悲痛中首次认清无论是贵族小姐娇娘，还是底层婢女飞红，在封建礼教与婚姻制度的双重规训下，都无法掌控自己的情感与命运，她们共同承受着封建礼教与阶级制度的压迫与戕害。飞红在这份打击下直面自己底层婢女的现实身份，

完成了自我价值的重构，不再以镜像的标准定义自身存在，直言“我飞红自顾才貌，不下于人，寄身侍妾，不得配个年少才郎，长自闷怀。如今看了小姐，倒也放下了许多”开始以独立的主体视角审视自身的价值与命运。

结语：

孟称舜以《娇红记》命名剧本，是有意让后人看见“飞红”这个形象的。在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突破以往研究还原飞红形象的本质内涵，更让我们看到了《娇红记》超越单纯爱情悲剧的深层价值。飞红的形象嬗变是晚明封建女性生存境遇的微观缩影，从对理想自我的镜像追逐，到阶级桎梏下的挣扎，再到对女性共同命运的觉醒，既彰显了底层女性对自我价值的执着探寻，也揭露了封建礼教与阶级制度对女性的双重压迫，《娇红记》由此成为叩问封建时代女性命运的经典文本，也正是《娇红记》在当代依然具有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 刘卫珍.论传奇《娇红记》对娇申故事的承袭和变化[J].四川戏剧,2020(4):123-125.
- [2] 刘婷婷.时代的悲歌女性命运的缩影——浅析《娇红记》中的“怨谱”[J].戏剧文学,2020(10):99-103.
- [3] 周礼丹.《西厢记》中红娘与《娇红记》中飞红形象比较[J].文教资料,2015(36):163-165.
- [4] 庞越.《娇红记》的舞台性[J].四川戏剧,1997(6):41-45.
- [5] 唐昊.有情女子何处去?——新论《节义鸳鸯冢娇红记》的戏剧作品内涵[J].戏剧之家,2023(24):27-29.
- [6] 申港慧.浅析《娇红记》中“飞红”的女性意识[J].戏剧之家,2018(18):234+236.
- [7] 任小芳.《娇红记》之婢女形象探微[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32(2):36-41.
- [8] 拉康.镜像阶段作为“我”的功能构筑者[M].褚孝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8-40,35-37,39-41.
- [9] 拉康.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M].褚孝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60-62,59-61,63-65.
- [10]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07.564.
- [11] 拉康.论自恋:一篇导论[M].陈小燕,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76-78页.
- [12]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38-240.

作者简介：杨生莉（2001-），女，汉族，安徽池州人，硕士研究生，安徽大学，研究方向：中国戏剧史。